



理论文库

评估中国对环境健康挑战的应对

刘化军 李磊译

2009-04-15

【内容摘要】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网站 (<http://www.wilsoncenter.org>) 刊登了吕筱青与季北慈 (Bates Gill) 合写的文章《评估中国对环境健康挑战的应对》。文章认为, 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广泛的环境破坏对国民经济、公共卫生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利影响。不断升级的给人们健康带来威胁的环境污染困扰着中国许多地区。环境污染对南方 (缺乏管理但是是工业飞速发展的热点) 和广大农村地区 (农民缺乏资源和医疗保险应对环境污染引起的疾病) 人们健康的影响可能最为严重。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障碍是政府间在环境健康问题上的协调不足以及缺乏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的参与。文章内容如下。

【关键词】 中国; 环境保护; 环境污染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网站 (<http://www.wilsoncenter.org>) 刊登了吕筱青与季北慈 (Bates Gill) 合写的文章《评估中国对环境健康挑战的应对》。文章认为, 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广泛的环境破坏对国民经济、公共卫生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利影响。不断升级的给人们健康带来威胁的环境污染困扰着中国许多地区。环境污染对南方 (缺乏管理但是是工业飞速发展的热点) 和广大农村地区 (农民缺乏资源和医疗保险应对环境污染引起的疾病) 人们健康的影响可能最为严重。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障碍是政府间在环境健康问题上的协调不足以及缺乏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的参与。文章内容如下。

一、中国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

中国大范围的污染问题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虽然过去27年的快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使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贫困, 但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在其新近发表的《中国环境表现回顾》报告中声称: 中国有些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属于世界上最差的等级; 能量强度大约要高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20%; 大约1/3的水域受到严重污染。垃圾处理、沙漠化和保护自然与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中国国家环保总局 (SEPA) 副局长在2007年7月一份严厉的声明中承认, 中国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使得环境“濒临崩溃的边缘”。

普遍的日益恶化的环境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由中国环境规划院和国家统计局发表的首篇关于“绿色国民经济”的报告显示, 在2004年, 环境污染给中国可能已经造成了共计640亿元的损失, 也就是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05%。据报道, 由于来自地方官员的压力和担心社会动荡, 中国已无限期推迟了其主导的一项研究, 该研究本应该就因污染导致的高昂经济代价和GDP损失或所谓的绿色GDP作出更详尽的研究。

中国领导人正普遍意识到环境污染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代价, 并已经试图转向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北京倡导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理念部分地反映了这种新的使命。中央的经济决策已经开始关注环境污染问题。例如, 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强制性目标, 即在“十一五”期间

(2006—2010) 使生化耗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减少10%。国家环保总局最近公布了一系列新的更加严厉的规则来应对日益恶化的湖泊污染，同时严惩地方“土政策”或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它们使得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对环境污染熟视无睹。然而，不幸的是，中央的命令往往在省一级和地方政府被搁置或被忽视，在那里，人们对经济高增长的关注超过了环境保护。

二、越来越多的环境健康问题

迄今为止，人们还是侧重于用经济损失来衡量环境恶化的影响，而污染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显然威胁到了国民的健康，但是，由于多年的疏忽、缺乏政治层面的关注及研究资源不足，中国关于环境污染对健康的真实影响以及环境和健康之间的量化关系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极其有限。

由于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癌症、新生儿先天缺陷以及免疫系统损坏增多——使得公民抵御各种健康风险的能力更加脆弱，因而危及到国民的健康。大量中国人正饱受由环境恶化所导致的健康问题的折磨。证据表明，污染和环境恶化已导致一系列慢性健康问题，如消化道疾病、腹泻、哮喘、支气管炎、结膜炎以及急性中毒和死亡。由世界银行即将公布的一项报告表明，在中国每年大约有5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

（一）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空气污染是影响国民健康的主要危害，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尤其如此。由于作为首要能源来源的煤炭被大规模地以不清洁的方式使用，所以空气污染已成为中国最明显的、最危险的环境问题，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国。卫星数据表明北京的空气中二氧化氮的含量在全球而言是状况最糟糕的，而这会给肺带来致命的威胁。最近对中国522座城市的空气监测发现，其中39.7%的城市的空气质量属于中等污染或严重污染。国家环保总局声称，中国在2005年已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硫的最大排放国，而仅仅在约两年之后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二氧化碳（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为6.2亿吨。

毫无疑问，空气污染是导致中国年轻人患慢性肺病——其患者通常是老年人——人数急剧攀升的罪魁祸首。其他逐渐增多的与空气质量恶化相关联的健康问题包括呼吸道炎症、哮喘和阻塞性肺病等。中国估计有200座城市达不到世卫组织关于导致呼吸道疾病（这在中国正成为主要的死亡原因）的悬浮在空气中的颗粒的标准。

遭受空气污染也造成了惊人的、大量的人口过早死亡。由中国环境规划院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2003年中国411万人的早死——大多数死于与肺和心脏相关的疾病——应归咎于空气污染。中国科技部的数据显示，每年有5万婴幼儿可能死于空气污染。

（二）水污染导致的疾病和死亡

由日益恶化的水污染导致的疾病和死亡是人们关注的另一个主要问题。中国的河流、湖泊和水库——它们所在的地点主要临近南方那些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镇——普遍受到污染。国家环保总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70%的河流和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8%受到严重污染甚至不能用于灌溉和工业用途。中国90%的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而不能饮用。一个位于北京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指出，中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或至少3.2亿人正在饮用不洁净的水。水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在中国农村尤为严重，因为农村的环境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仍未健全。

对工业、市政和农业废水的处理不充分，使得中国水质危机日趋严重。中国大约有2.1万多家化工厂位于河流和海岸线附近，其中一半以上的化工厂位于两条最重要的河流（长江和黄河）沿岸，而数以亿计的人依靠着长江和黄河来解决饮水和生存问题。上游工厂的水污染给沿岸许多居民——他们依靠被污染的水来饮用和进行农业灌溉——的健康造成了威胁。因此，中国所谓的“癌症村”正在激增。

2005年11月爆发的松花江水污染危机是最严重的水污染个案，在这次危机中吉林省一家国有石化厂向松花江倾倒了数以百吨的致癌化学物质，包括苯和硝基苯。松花江从吉林流向邻省黑龙江，并为其省会哈尔滨提供饮用水。事故发生后，政府起先是试图否认和掩盖，最后不得不切断饮水系统达4天，以防止哈尔滨380万居民遭受苯污染。松花江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这件事过后不到一周，中国南方的广东宣布，由于一熔炼厂的大量有毒气体泄漏到了北海，省会广州的供水受到威胁。

严重的水污染也加剧了中国天然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倒数第二的

国家，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缺乏充足洁净的水，尤其是水污染导致的土地和食物污染，给国民的公共卫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中国主要河流（淮河、海河和黄河）沿岸的地区居民患癌症和肿瘤以及发生自然流产和智商低下的机率要高于正常水平。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大约有3万中国儿童（主要是农村儿童）死于与饮用不洁净的水相关的疾病。

除了空气和水污染之外，近些年来有关其他环境污染物所导致的健康危害的报道也逐渐增多。过度使用化肥、被污染的水、重金属和固态废料正使中国全国的土壤受到污染。2007年，国土资源部声称，中国超过10%的或大约1.23亿公顷的可耕地被污染，而且局面正在恶化。再加上农业种植面积缩小，可耕地的污染给国家的食品生产、粮食安全和人们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三）一个国内和全球关注的问题

尽管缺乏关于污染对健康的真实影响的官方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日益恶化的环境已经危及很多居民的生命安全。中国贫穷的农村地区面临的环境健康风险尤为突出，几乎90%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中国领导层正在更加认真地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是为了提供有效的医疗保健，他们继续在以政府为基础与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之间艰难徘徊。

在中国农村，人们接触到能够诊断出环境引起的健康问题的医务工作者的机率很小。污染引起的疾病影响到国民的公共健康记录，破坏了生产力，并且增加了医疗费用。经合组织2007年引用世界银行早期统计数据所做的报告预测，到2020年，污染将导致中国城市每年有60万人过早死亡和2亿人患呼吸道疾病。治疗由空气污染引起的健康危害的总费用将占到GDP的13%。

环境对健康造成的危害同时也引起了中国社会的不安定。中国公安部在2006年声称，在2005年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上升了6.6%，达到了8.7万件。其中许多社会不安定事件都是公众对污染和污染导致的健康威胁感到愤怒的结果。随着北京高度重视减少发生“群体性事件”，快速而有效地解决环境健康问题已成为一项关键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环境健康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内部问题。随着中国立志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和更加杰出的全球事务参与者，它的繁荣和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公共卫生状况相关）对世界至关重要。此外，中国一些与污染相关的健康危害已开始蔓延至其他国家。例如，在近些年，中国西北部沙漠化所引起的沙尘暴已把风沙吹到日本、韩国甚至美国西海岸上空。同时，恶劣的环境健康记录加剧了传染性疾病的全球传播。据世界银行报道，2003年爆发的SARS在那些空气污染程度较高的地区最为剧烈。中国其他的由水传播的疾病和土壤退化与水土流失所导致的疾病通过跨界河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邻国。因此，在中国出现的新兴的、复杂的环境健康问题对国际社会利益影响重大。

三、中国的反应

虽然中国领导人和决策层看起来意识到了污染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污染给人们健康造成的严峻形势。例如，虽然政府通过了大量的关于保护资源与控制污染的法规，但很少有人提出一个清晰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应对环境健康问题。总的来看，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人们对污染导致的健康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仍处在较低的层次上。

（一）不协调的官僚机构的反应

国家环保总局、卫生部及其在各省和地方的分支机构，主要负责处理中国的环境健康问题。虽然中国政府在使用控制污染的技术和策略上有了改进，但国家环保总局、卫生部及其地方分支机构对新出现的环境健康威胁的应对是极其有限和不协调的。

1. 国家环保总局——薄弱的环境监管机构

环保局是负责环保的主要政府机构，它在省、地、县有它相应的分支单位。环保局负责全国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工作，主要包括污染控制、自然生态的保护以及环境监测。但是，由于它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和人员缺乏，其单个机构难以使环境健康问题引起政治和科学层面的充分关注。

在过去的几年里，环保总局已参与很多双边和多边援助机构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环保援助计划。但在中国，环境健康威胁很少成为环保援助的重点。一个显著的特例是美国环保署在其综合环保战略倡议之下所进行的环保研究，这项研究在中国开始于1999年。在综合环保战略思想指导之下，美国环保署、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及各个不同的研究中心通过诸项研究来评估使用清洁能源和运输技术以及实施相关政策如何有利于解决当地的空气污染问题、与此相关的民众健康问题以及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首批研究的两个重点地区是北京和上海，全国范围的研究当前正在展开。上海的研究结果促

使政府在其“十五”规划中加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减少空气污染的措施，这向决策者强调了多进行环境健康研究的价值所在。正在进行的全国范围的研究目的之一在于检验以下政策和措施——它们将帮助中国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同时实现能耗降低20%、二氧化硫排放减少10%的目标。

除了综合环保战略外，美国环保署和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在2006年开始合作研究对危险废弃物的处理，2007年两国签署农业化学污染控制合作计划。但是，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与其国际伙伴的合作远远落后于遍布全国的、日益恶化的环境健康威胁。中国的一些大学也已与美国同行一起在开展环境健康问题的研究，这对于形成有关污染与健康之间联系的关键性数据而言，可能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国家环保总局也正在与其他国际伙伴一起进行咨询和培训活动。例如，在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赞助和商业部的引导下，国家环保总局已为约150位非洲官员和专家开办了四次培训班，在环境治理、环境法以及环境风险评估等方面提供信息和交流。又如，国家环保总局每年就区域环境问题同日本和韩国举行协商会议。但是，这些国际交流似乎还没有集中关注中国任何具体的由污染引起的健康问题，而这对于所有相关国家而言都是一个可供有效交流的领域。

2. 中国卫生部

在中国，卫生部是负责与健康有关事务的最高行政实体，其职能主要通过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得以实施，该中心确实关注与污染有关的疾病。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在其任期内关注过环境健康问题，但卫生部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往往主要应对污染对健康造成的后果，而不是采取积极主动和预防性的做法。

3. 竞争还是合作？

2007年2月，卫生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出台了一份文件，旨在建立一个关于环境和健康的协作机制。8月，这两个机构在上述协议下宣布了下述行动计划：（1）卫生部和环保总局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其秘书处由两个机构的领导联合主持；（2）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帮助指导建立专题工作组；（3）联合开展环境健康监测、调查及研究；以及（4）共同处理公共环境突发事件。建立这样一个机构间的协作机制带来的希望是，能够促进更好的数据生成、教育和培训。然而，由于要求两个各自独立的官僚机构进行合作所存在的复杂性，要使新计划真正付诸实施——尤其是地方层面，仍面临挑战。

国家环保总局和卫生部并不单独负责规范环境健康问题。例如，它们必须与其他政府单位共同承担垃圾处理（这是一个与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相比人们的关注要少得多的环境问题）的责任。建设部对城市垃圾（这可能是中国在垃圾处理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负有主要责任，它负责监管城市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储存、运输和处置。商务部负责纸张和瓶罐物品的回收，而水利部负责处理和处置被污染的河底淤泥。

由于官僚之间的势力斗争，环保、卫生部门的官员和其他部门的官员很少一起合作。这种官僚机构之间的脱节现象也反映在地方层次。由于对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联缺乏认识，这方面的官僚权限又划分不清，这意味着政府无法针对因污染导致的健康威胁作出有效的应对。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对各方努力进行调动、协调和监测的全国性实体，以改善中央和地方在环境卫生方面的状况。

2007年8月的行动计划表明各方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较大的跨部门的机制来应对环境健康问题，除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国家环保总局外，还吸收了包括水利资源部和建设部等其他部门。在2007年秋季国务院会议之前，这一更具有雄心壮志的合作机制将制定一项将重点放在环境健康上的10年计划，它涉及以下领域的研究和管理对策：（1）空气污染与健康；（2）水污染与健康；（3）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以及（4）与固体废弃物处理不充分相关的健康问题。在中国，这一倡议是否能得到批准，以及它是否可以克服困扰中国部门间合作的典型性困难还有待观察。

卫生部负责环境健康研究的主要机构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属的国家环境健康与相关产品安全研究院（IEHS），它为制定环境健康的政策和法规提供科学证据和技术支持，开展与环境健康有关的研究和调查以及实施国际合作计划。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健康与相关产品安全研究院作为国家专业的处理环境健康及相关事务的实体单位在两个不同的官方机构（卫生部和国家环保总局）下运作。由于卫生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负有不同的环境健康使命，因而它们可能对环境健康与相关产品安全研究院的工作施加不一致的影响。这反映了环保和卫生部门的官员对其职责与有效的合作方式仍然认识不

够。而且，虽然现在支持环境健康与相关产品安全研究院工作人员和启动新计划的资金比较充裕，但其官员担心他们缺乏对环境健康风险实施高级研究、监测和评估的适当技能和技术。

环境健康与相关产品安全研究院已参与了一些与外国同行的合作。例如，它已与“室内清洁空气伙伴关系协会”合作开展室内空气污染的研究。在“室内清洁空气伙伴关系协会”的指导下，环境健康与相关产品安全研究院正在开展一项由环保局资助的研究项目，以提高遍布贵州和甘肃两省农村的煤和生物燃料的有效使用效率。这项合作研究计划的目的在于降低中国贫穷农村地区室内空气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国家环境健康与相关产品安全研究院也已成功地与耶鲁大学的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联合申请建立了耗资100万美元、为期5年的培训和交流项目，参加者为这两个机构的环保专家。又如，环境健康与相关产品安全研究院正在与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对中国7个县进行研究，以评估气候变化对弱势人群如孩子和老人健康的影响。它还与印第安纳大学合作以评估重金属污染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2007年11月，环境健康与相关产品安全研究院将主办由卫生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共同赞助的环境健康国际会议。

在地方层面，自2001年以来，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与美国最大的国家环境健康计划之一——加州公共卫生部的环境健康调查科——合作开展上海—加州环境卫生培训计划。通过培训、合作研究与能力建设活动，这个计划已使上海的公共卫生活动得到了加强。这个非常成功的计划突出了这一国际合作大有前途的领域，它可以加强中国地方一级健康机构应对环境健康挑战的能力。

（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脱节

执行中央关于环境与环境健康的指令的责任很大程度上落在地方当局身上，然而，中央和地方当局在意识和政策实施方面存在相当大的脱节。

为了遏制污染，北京已通过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和标准，并投入了大量资金。例如，颁布了2007年7月1日生效的、针对饮用水的新标准——这是自1985年以来首次颁布的新饮用水标准，它使衡量饮用水安全的数字指标由35项上升到106项。原则上，地方官员接到新指令后，常常被要求参加学习班和其他培训课程以了解其内容及学习如何正确执行它们。然而，尽管地方环保机构可能愿意且能够实施更严厉的规则，但它们的政治领导人常常不愿意投资于环境保护而宁愿选择经济和工业发展带来的政治和金钱回报。国家环保总局的地方机构由于资源不足以及在政府机构中影响不够——这是由拥有强大资源的利益集团（如地方开发商、当地企业以及那些拥有很高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的当地高级官员）造成的——而面临特殊的困难。由于中央指令和地方执行之间存在相当的脱节，北京的治理行动往往使污染以及与污染有关的健康威胁有增无减。

（三）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

中国在处理环境健康危机时忽视的另一因素是公众参与。在当今的中国，虽然与环保相关的公民团体构成了最大的民间团体，但由于政府对民间团体的提防态度以及政府对民间团体等社会团体在登记方面的复杂规定使得民间社会团体只能追求相对安全的工作领域。很少有基层团体参与与环境健康问题相关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常常将民间团体置于与地方政府所有的企业相对立的地位。例如，在过去的两年，两个中国环保活动家由于寻求水污染问题方面更大的透明性而被地方政府压制。中国从事环境健康工作的民间团体有：（1）致力于调查四川省农村地区污染和健康问题的重庆绿色志愿者联盟和（2）淮河卫士——它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流域——淮河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肿瘤、癌症和皮肤病的发病率提高了。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农药的生态品替代中心，一个对农药问题组织开展研究和推广，并提倡替代性虫害防治方法（其目的在于阻止农业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生态健康的威胁）的民间环保组织。然而，这类团体的整体数量仍然非常少。而且，由于缺乏资金、政府支持和社会捐助，它们的活动能力也非常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香港的民间社会组织——“民间交流”（Civic Exchange）一直在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空气污染和环境健康进行积极的研究和调查。“民间交流”对于推动香港的科学家推行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和更多的跨界合作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个民间组织为大陆一些环保团体如何开展环境健康工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模式。

在最近几个月里，中国当局由于怀疑一些团体可能充当了西方外交政策的代理人，已经加强了对环境、卫生和其他领域的民间社会团体的管制。这种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源于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发生的“颜色革命”。政府的严格控制和民间团体能力低下，就使得这些民间团体很难

成为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管者或成为处理环境健康威胁的主要参与者。没有这样的团体，中国公众——作为环境健康威胁的首要受害者和一个最有趣看到环境健康威胁以更大力度得到治理的群体——必须在环境决策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四）未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中国面临严重的环境健康挑战，另一方面，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应对又不足，这两者之间差距之大令人警惕而且可能日益扩大。这将需要一些重要的改变来改善中国薄弱的处理环境健康挑战的记录。

1. 增加透明度和问责制

在中国，随着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和普遍，人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收集和分析准确的数据，以便测定环境状况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影响和评估各种政府计划的有效性。中国政府应该允许污染对健康的影响这一问题的透明度日益提高，地方官员应对其管辖内的环境记录负责。必须加强和强化把是否努力改善环境作为评估地方官员政绩和决定其晋升前景的一个重要标准。

2. 跨机构合作和更好的环境治理机制

面对不断增多的环境健康事件，中国需要一个全面的、部门间的协作战略以阻止局面继续恶化。国家环保总局和卫生部以及它们的地方分支机构，应更加团结协作以制定共同的全面的策略以改善国家的环境卫生状况。这种协作机制也应该涵盖其他相关的政府机构，如农业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门。最终，将需要一个部级以上的实体机构或工作组——由副总理级别的人来领导——给部门间的合作带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并确保协调一致的、有效的政策能够落实到位。

3. 扩大决策中的公众参与

地方政府对民间团体反污染运动工作的压力使这些团体在相当程度上并没有成为解决国家日益增多的污染和健康困境的伙伴。应当鼓励民间社会团体参与与环境和健康有关的计划和决策。在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在处理公众健康挑战（如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经验已证明，它们作为服务提供者，而不仅仅是倡导团体，在处理环境健康问题方面可以十分有效地动员社区、提高认识、制定解决方案和实施计划。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央政府在倡导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方面有了进步，但这些政策在地方层面需要得到更好的推动。

4. 迈向国际合作

既然中国的环境健康威胁对国际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国际社会应加紧同中国合作来应对面临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出的极有希望的努力是在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建立了环境与健康区域体系。这个论坛于2004年开始筹备，到2006年已把亚洲的环境与健康部门的部长们聚集在了一起。这一区域论坛的目的旨在通过提供一个信息共享、改进策略和管理框架并促进综合环境健康战略和规章执行的机制，来加强这些国家内负责环境与健康事务的各部门间的合作以及跨区域的合作。中国的卫生部和国家环保总局正在参加这一倡议，非常明显的是，它们正在制定一项全民环境健康行动计划。如果在应对这一新挑战时北京真的想加强部门间合作的话，这个论坛可以为卫生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在环境健康问题方面实现更好的整合提供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少数美国大学正在与中国同行开展环境健康方面的工作，这代表着一个能够为更好的决策提供重要数据的有前途的趋势。但就美国政府而言，除了极少数环保局的项目外，在中美环保合作方面并没有突出环境健康的地位。美国环保局的项目，像所有美国政府在中国的环保措施一样，得到的资金很少，也没有被放在优先地位。新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为重振双边能源和环境合作提供了一个机会。但这些领域所有的新的合作，都应尽力将环境引起的健康问题囊括在内。解决中国日益增长的环境健康挑战要求加强中国同其国际伙伴（包括美国在内）的合作。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3期）（译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